

金融与发展

FD
&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2012年10月号

妇女能否拯救日本
(以及亚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妇女 能否拯救日本 (以及亚洲) ?

查德·斯坦伯格

支持妇女在
工作和家庭
之间取得平
衡的政府政
策有助于日
本在全球经
济中保持参
与者的角色

“日本妇女很难在抚养孩子和全职工作之间取得平衡，”来自横滨的35岁的理疗师中村直美这样说道，如今她正在休产假，以照料她四个月大的女儿。“许多公司不允许缩短工作时间，即使公司允许这么做，鉴于工作时的氛围，女性员工也常常不愿意从事非全日工作，”中村解释道，她还有一个三岁的儿子。

对于中村而言，要在工作、抚养孩子和家庭之间取得平衡并不容易。在儿子出生之后，中村十分幸运地在她供职的公司附近找到了一家日托中心，但她仍然要带着儿子骑20分钟的自行车才能到达上班的地方。她曾试图为儿子找一家教育日托中心，结果发现竟无一家可供选择，于是不得不将儿子安置在一个只提供儿童护理服务的中心。她会在回家的路上顺便购买一些生活用品，将其放在自行车前的篮筐里，而她的儿子则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

与大多数的日本父亲一样，中村的丈夫每天晚上都工作到很晚，因此她独

自一人为孩子们做饭、洗澡并哄孩子睡觉。然后，她才开始为自己和丈夫做晚饭。到深夜，他们两夫妻才能吃饭，上床睡觉时已经筋疲力尽了。

中村颇费了一番功夫才找到了一家托儿中心，但是假如该中心因儿子生病而打电话给她时，她常常会深感不安，因为她必须提前离开办公室。在中村休产假之前，经常是她的丈夫早上把儿子送到该中心，晚上由她把孩子接回来。但是，当她丈夫出差时——这几乎是常有的事情——两项任务都落在了中村的肩上。“当我不得不提前离开办公室时，我深感对不起我的同事们，因为他们不得不完成额外的工作，”她说。

但是，与她的朋友们相比，中村仍然感到十分幸运，因为她拥有热门的工作技能。她的许多朋友在休完产假后要么被告知不能继续从事原有的工作，要么不得不千方百计地找非全职工作，因为对于可能不得不请假照看生病的孩子的员工，雇主常常颇为不满。

中村的故事是日本各地和亚洲部分

地区许多妇女的共同遭遇。她们每天都要在工作 and 家庭之间艰难地权衡，这种梦魇般的感觉令她们望而却步，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她们必须在抚养孩子和谋求职业生涯之间作出选择。

因此，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亚洲经济体的女性走出家庭去工作的比例相对较低。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比男性低 24 个百分点，韩国的这一比例相差近 22 个百分点（见图 1）。在某些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一差异甚至更高。相比之下，在中国和越南，差异并不那么突出，其部分原因是社会偏好有所不同。

在针对各个国家之间及其内部的同时期女性劳动力经济参与差异进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政府政策是解释参与率差异的重要因素。我们还发现，在消除障碍以增加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率并藉此帮助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方面，日本（及其他亚洲各国）还可以做得更多。

女性趋势

1985—2005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劳动参与率从 61% 增加至 77%（见图 2）。此外，参与率之间的差距开始呈现出缩小的态势：参与率较低的国家开始追赶上劳动力参与率更加均衡的国家。这些变化大部分都伴随着社会对女性参加工作的接受程度的提升。但是，其他两个因素也颇为突出。

首先，与以往相比，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这无疑会提高她们潜在的终生收入并使其与劳动力市场发生更加紧密的联系。实际上，平均而言，如今许

多国家的女性比男性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例如在过去 10 年中，首尔国立大学女性大学生所占比例从约 1/4 上升到近 1/2。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促使更多女性走进职场，并降低了其脱离职业生涯、专门照料孩子的意愿。

其次，世界各地女性的结婚年龄日益推后，而且她们倾向于少生孩子。因此，许多妇女在不得不选择是否该呆在家里之前就已经立业。此外，少生孩子就意味着做家务及养育孩子的需求并不那么令人望而却步，这使得女性在权衡工作和家庭生活时更加从容——在以往，要作出这些选择根本不太可能。

尽管如此，人口结构的变化并不足以解释各国之间的所有差异。因为政府政策也在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如若审视一下各个国家最近几年的生育率和女性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则可发现政策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较低的生育率可能同时伴随着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但二者间的关系实际上要复杂得多（见图 3）。这表明政府政策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我们的实证分析所证实的那样。毋庸置疑，生育政策最宽松的国家的生育率（不含高移民接收国）和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也最高。具有积极影响的政府政策包括保育支出、育婴假，以及废除对家庭中第二工资获得者不利的陈旧税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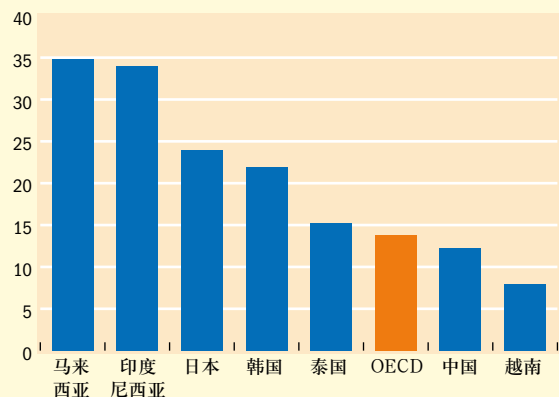
灵活变通的环境

中村发现很难在工作 and 抚养孩子的职责之间作出平衡。她说，如若没有母亲的帮助，她根本不可能在

图1

亚洲女性的就业人口相对较少

日本与其他许多亚洲经济体在劳动参与率方面存在性别差距。（男性和女性在劳动参与率方面的差距，2009年，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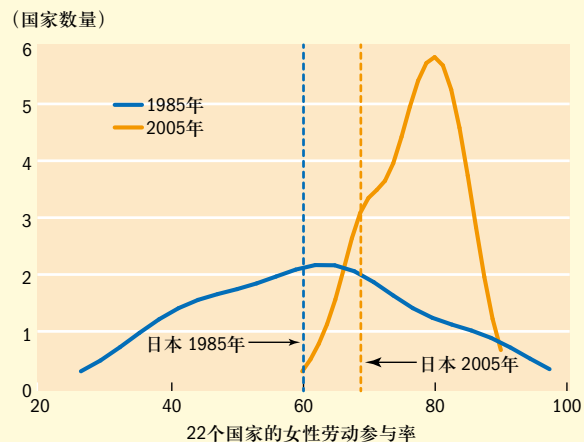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IMF员工的计算。
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图2

就全球范围来看，就业女性的数量相对较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OECD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逐渐增加，且呈现出日渐明显的趋同性。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抚养两个孩子的同时又参加工作。她母亲的居住地离这里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当日托中心出现了问题，而她又不得不工作时，就由母亲来照料孩子。在日本，人们很难雇到临时保姆。

日本总务省于2010年对日本妇女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34%的受访对象认为她们没有参加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受家务拖累，14%的受访者认为主要原因是工作时间的问題。2007年，韩国劳动部做了一项类似的调查，发现60%的接受调查的女性认为抚养孩子是参加工作的最大障碍。二三十岁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的大幅下降反映出这种平衡行为所面临的巨大困难。这种情况在日本尤为普遍，即使日本女性在职业生涯起始时期的劳动参与率与其他国家女性一样高。

在许多北欧国家，政府政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瑞典政府推行了综合性的育婴假政策、高补贴的育儿体系和缩短女性工作时间的严格政策。这些体系提高了女性在生育孩子之后重新返回职场的比率——超过90%。与此同时，在荷兰，政府一直把重点放在改善非全日工作的待遇上，旨在使其与全日工作一样诱人：可相提并论的时薪、福利和就业保护。对日本和韩国而言，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经验，因为两国中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现象——喜欢圈内人士而非新加入者——日益普遍，这种现象可能阻碍潜在的非全日工作者进入劳动力大军，而这些工作者往往是担负着家庭职责的女性。

我们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政府政策的重要性。我们发现，育婴假政策和政府保育开支及其他保障性政策与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然而，亚洲各国政府提供的此类福利并不太多（见图4）。

这部分反映了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即使在亚洲最为发达的经济体中，仍然存在福利方面的差距。瑞典在保育方面的开支是日本的四倍，是韩国的六倍。

行为典范

亚洲女性的另一项突出特征是日本和韩国的女性经理人数明显不足（仅为9%），相比之下，美国的女性经理人占43%（见图5）。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稍微好一些，但程度有限，分别为14%和17%。然而，泰国在这方面的表现相对较好，女性经理人占29%，稍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值。

女性经理人的缺乏不仅仅是因为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而且还因为（某些国家）旨在阻碍女性担任职场管理职位的体制。例如，在日本，职业升迁通道中的女性仅占6%。中村在很早的时候就决定既工作又抚养孩子，因此在她上高中时便开始认真谋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了。她决定使自己具备职业专业化能力（获得某种许可或证明），以确保她与男性进行公平竞争。但是，她表示，一些女性可能倾向于在全职的专业职位和压力较小的非职业化工作之间进行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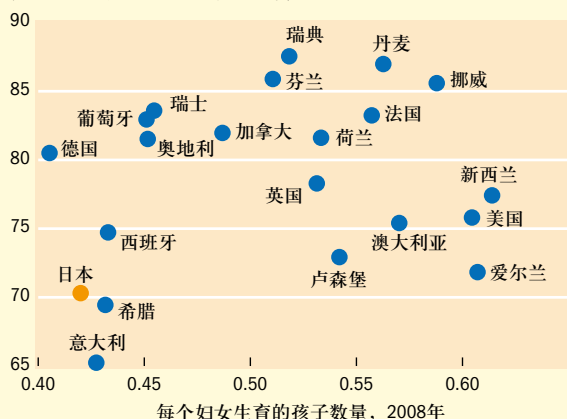
女性经理人数量少的另一项可能原因是她们自己选择非职业升迁通道的职位。这个过程似乎在早期便开始显现了，因为一流大学的性别比例已经呈现出了较大差异。例如，在以考试分数为录取依据的东京大学，女生比例还不到20%。

提高拥有高端职位的女性数量将有助于鼓励其他人效仿这种行为，从而促使其选择职业升迁通道中的就业岗位。有迹象表明，目前正在发生某种改变：

图3
养育孩子与参加工作

当女性生育的孩子相对较少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并未自动增加。

（22个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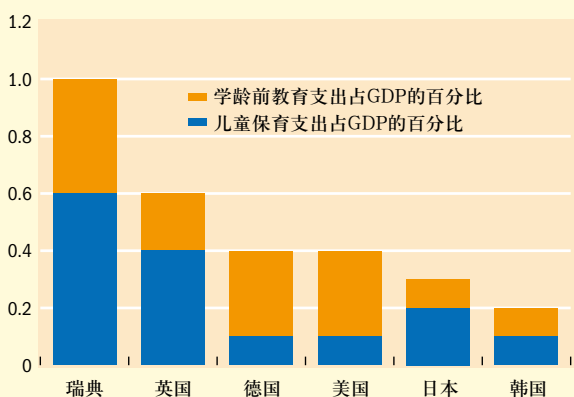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图4
子女抚养费

亚洲儿童保育和学龄前教育的公共开支比其他发达经济体少得多。

（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10年，日本银行任命了首位女性支行经理；2009年，大和证券在有约50名成员的董事会中设置了四位女性董事；2010年，资生堂设定了一项目标，即在2013年之前使女性经理人的比例达到30%。如欧盟目前正在考虑的那样，韩国的政治家已经在考虑制定法律，以便确定企业董事会中女性董事的最低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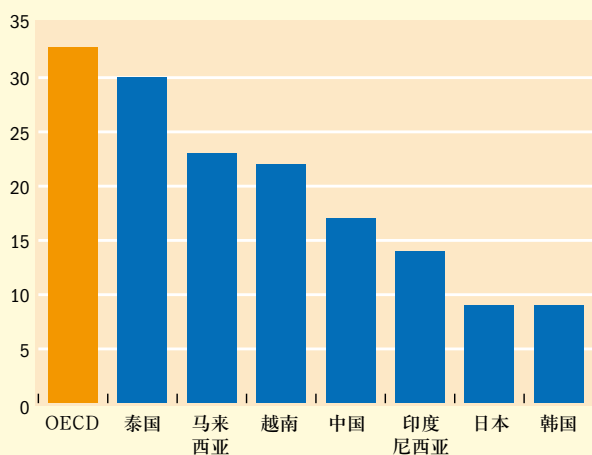
女人拯救经济

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不仅可以提高整个亚洲地区的性别平等，而且还有助于大幅提升和维持经济增长

图5

谁是负责人？

日本和韩国的女性经理人远远少于大多数的发达经济体。（占总数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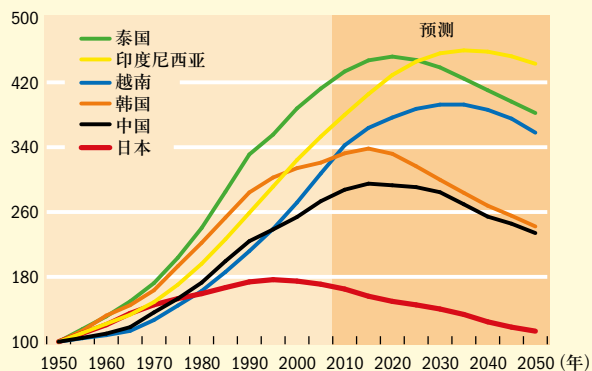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图6

工作人口短缺

在整个亚洲地区，适龄工作人口正在减少，日本的情况尤为严重。在日本，适龄工作人口一直较少，而且目前减少的幅度最快且最迅猛。

（适龄工作人口数量的变化，指数，1950年=100）



资料来源：联合国；IMF员工的计算。

率。世界各国正日益艰难地应对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影响（见《金融与发展》2011年6月号，“认清老龄化的成本”）。因此，各国需要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包括本国国民。在日本，适龄工作人口（年龄介于15—64岁）规模将从1995年8700万的峰值下降到2050年的5500万——约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的劳动人口（见图6）。日本劳动人口的这种降幅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亚洲的其他经济体也同样前景堪忧；据预测，韩国和中国的劳动人口也将出现急剧下降。

假如目前快速增长的生产率无法继续超越工作者数量的降幅，那么老龄化社会的经济甚至可能出现萎缩。日本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比其他任何发达经济体都要严重，有鉴于此，日本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将导致每年潜在的经济增长减少约1/4个百分点。帮助减缓这一趋势的一个简单途径是增加未充分就业群体的劳动参与率——在几个亚洲经济体中，其中包括日本和韩国，此类群体往往是女性。

育婴假政策和政府保育开支及其他保障性政策与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倘若日本在未来的20年里把女性劳动参与率从62%提升至其所在的七国集团中的其他国家（不含情况迥异的意大利）的70%的水平，那么其人均GDP将提高约5%。如若将女性劳动参与率进一步提高，达到北欧的水平，则可使人均GDP额外增加5%。根据第一种假定方案，在过渡期的几年中，GDP的增幅可达到约1/4个百分点，根据第二种假定方案，增幅为1/2个百分点。鉴于日本中期的GDP的潜在增长率约为1%，上述增幅意味着日本在过渡年份中可以将潜在产出提高25%—50%。

假如中村生活在瑞典，她将获得使她能够“鱼与熊掌兼得”所需的支持，而且在休完产假后，她会毫不犹豫地回到此前的工作岗位。如果让像中村一样的女性更加容易地成为劳动大军中的一员，那么这将有助于使日本保持全球经济参与者的角色。充分发挥亚洲女性的作用是一项合理且公正的促进增长的战略。■

查德·斯坦伯格（Chad Steinberg）是IMF战略、政策与检查部的高级经济学家。此前，他曾在位于东京的IMF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办事处任职。

本文基于作者与中根诚人共同撰写的一篇2012年IMF工作论文“妇女能否拯救日本？”



有关《金融与发展》的更多信息, 请见:

www.imf.org/fandd

www.facebook.com/FinanceandDevelopment